

## 中国经济减速是“新常态”吗

○ 李艳军, 华 民

(复旦大学 经济学院, 上海 200433)

[摘要]“新常态”论将中国经济减速解释为追赶进程从高速向中高速增长阶段的转换,并逐渐成为主流观点。通过回顾历史,可发现“新常态”论与世界各主要国家经济增长的历程并不相符合,也并未发现所谓的“追赶周期”。基于中国现实的分析则表明,中国经济依然具有高速增长的潜力。中国经济减速属于“增长型衰退”,真实原因在于近年来实施的经济政策逐渐显现负面效应。因此,坚持贯彻执行十八届三中全会重大决议,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政策转向,中国经济仍可恢复高速增长。

[关键词]中国经济减速;新常态;经济政策

### 一、引言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增速在波动中持续下滑。2007年,中国GDP增长率为14.2%;而到了2015年,GDP增长率下降至6.9%,增速已经不及2007年的一半。<sup>[1]</sup>根据IMF的预测,中国经济增长率将进一步下滑,2016年的预测增长率被进一步下调至6.3%。<sup>[2]</sup>

如何看待中国经济减速?对此,经济学界存在一些争论。张军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减速不是“新常态”,而是“非常态”。<sup>[3]</sup>华民指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并未终结,“新常态”论是中国经济的理论误区。<sup>[4]</sup>2014年以来,“新常态”论逐渐成为主流观点,乃至“共识”。<sup>[5]</sup>笔者以“新常态”作为“篇名”关键词检索中国知网期刊论文数据库:2013年的相关发文数量为14篇,2014年增加至968篇,而

---

作者简介:李艳军(1988—),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国际经济学、中国经济改革;华民(1950—),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方向:世界经济。

2015 年则已经达到 4887 篇。<sup>[6]</sup>同时,国内众多研究机构召开经济论坛或研讨会,对“新常态”进行研讨。“新常态”骤然成为中国宏观经济领域最热门话题。

如何认识经济减速势必影响政府部门的决策。2014 年 5 月,习近平同志在河南考察时首次提及“新常态”。2014 年 8 月 5 日至 7 日,作为官方媒体的《人民日报》连续三天发表系列评论,阐释“新常态”的具体内容。2014 年 11 月,习近平同志在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上发表主旨演讲,表示“中国经济呈现出新常态”,并论述了“新常态”的特征。此后,2014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做出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判断。如果中国经济确实进入“新常态”,那就意味着减速是经济规律的必然结果,因而也就无需对经济政策进行方向性调整。

“新常态”论具有很强的政策导向,理应被更多地研讨和谨慎检验。然而遗憾的是,国内学界对“新常态”论基本上持一致认同态度,缺乏必要的理性批判。本文目的在于对“新常态”论的问题进行分析,并以此希冀更多的学术讨论。

## 二、“新常态”论的基本内容

### (一)后发经济体的“追赶周期”

“新常态”论将中国经济减速的原因,归结为后发国家追赶进程中的阶段转换。<sup>[7]</sup>“从后发国家追赶进程的长周期视角看,我国经济增长进入‘新常态’实质是追赶进程进入新阶段”,“是从高速到中高速增长阶段的转换”,“符合后发国家追赶型增长的一般规律,是后发优势内涵和强度出现变化后的必然结果”。<sup>[8]</sup>

图 1 追赶周期中的五个阶段<sup>[9]</sup>

“新常态”论认为,后发国家的后发优势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特征,并因此形成倒 U 型增速变化的追赶周期。<sup>[10]</sup>由于经济增长动力转换,后发优势逐步释放形成“追赶周期”的五个阶段,如图 1 所示。在起飞阶段,后发国家开始脱离低水平均衡,向高增长转换。随后,进入高增长阶段,由资本积累和 TFP1 共同驱动经济实现持续 20 - 30 年的高速增长。TFP1 是指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一种模式:大量剩余资源被有效利用,或从效率较低的农业部门转移至效率较高的非农业部门。随着市场空间变小,要素成本快速上升,资本积累速度开始下降,效率提升从 TFP1 向 TFP2 过渡,经济增长进入中高速增长阶段。TFP2 是指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第二种模式:模仿创新和行业内企业间的优胜劣汰。随着经济

进一步增长,经济进入中低速增长阶段,技术引进空间已经很小,国内市场趋于饱和,生产综合成本达到国际平均水平,投资率进一步下降,增长动力从 TFP2 向 TFP3 过渡。TFP3 是指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第三种模式:创造全新商品和技术路线或构建新商业模式。最后阶段是增速回归阶段,追赶进程基本结束,TFP3 成为主要增长动力。

刘培林等进一步指出后发优势取决于后发经济体与前沿经济体的技术水平差距,他们的模型实际上综合了经济增长理论的两类收敛机制:一是依靠资本边际报酬递减规律实现收敛,二是通过技术从前沿经济体向后发经济体扩散实现收敛。<sup>[11]</sup>他们采用劳动增强型的新古典生产函数  $Y = K^\alpha (AL)^{1-\alpha}$ ,因而可以刻画资本边际报酬递减规律。最关键的是对技术进步的假设。假设前沿经济体按照不变速率实现技术进步,而后发经济体的技术进步速度则取决于他们与前沿经济体之间的技术水平差距。因此,对于前沿经济体 F,技术进步率  $\dot{A}_F/A_F = \lambda$ ,  $\lambda$  为常数;对于后发经济体 C,技术进步率  $\dot{A}_C/A_C = f(\frac{A_F - A_C}{A_F}) = \gamma(1 - \frac{A_C}{A_F})$ 。在这样的假设条件下,后发经济体的人均资本增速、人均产出增速、资本回报率均将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 U 型曲线。

## (二) 中国处在“增长阶段转换”

“新常态”论认为,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已经发生变化,正处在从高速向中高速增长阶段转换的时期。综合众多学者的论述<sup>[12]</sup>,中国处在“增长阶段转换”时期的证据主要包括:1. 中国的人口红利消失,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劳动力廉价的比较优势丧失;2. 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中国对外出口的潜力耗尽,出口增长的空间越来越有限;3. 随着中国技术水平的进步,中国与前沿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逐步缩小,追赶难度越来越高;4. 环境污染严重,环境承载能力达到极限。

## 三、“新常态”论的检验:基于各国增长历史与中国的现实

“新常态”论对中国经济减速的解释基于两点:一是后发经济体存在所谓的“追赶周期”,是为理论基础;二是中国经济目前处在从高速向中高速增长阶段的转换,是为现实基础。我们分别采用世界各大国的经济增长历程和中国经济的现实对上述两点进行检验。分析表明,“新常态”论的理论基础与现实基础都没有得到事实支持。

### (一) 倒 U 型“追赶周期”并不存在

如果只是关注东亚成功追赶经济体在二战以后的增长表现,“追赶周期”理论似乎对后发经济体的增长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是,若将分析范围扩大至其他发达国家,并将分析的时间窗口拉长,“追赶周期”理论的解释力则大大降低。

18 世纪中期,英国最早开始工业革命,使得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国家。此后,英国始终处于世界经济的领先地位,即属于“前沿国家”。按照“追赶周期”理论的预测,英国经济在经过快速增长并成为前沿国家后,增速将会逐

步放缓并进入稳态增长。然而,英国经济增长的长期表现并非如此。我们首先对英国人均 GDP 时间序列数据进行 HP 滤波处理<sup>[13]</sup>,再计算出潜在人均 GDP 增长率。关于平滑参数  $\lambda$  的合理取值,现有文献尚有争议。本文参考 Backus 和 Kehoe 的作法,将  $\lambda$  都取值为 100。<sup>[14]</sup>如图 2 所示,1800 - 1850 年,英国人均 GDP 的年均增速为 0.44%;1851 - 1900 年,年均增速增长至 1.07%;1901 - 1950 年,由于两次世界大战的负面影响,年均增速略有下降,为 0.97%;1951 - 2000 年,人均 GDP 年均增长率达到 2.17%;2000 - 2010 年,年均增速为 1.72%。从长期趋势看,1800 年以后,英国潜在的经济增速并没有下降,反而有加快的趋势。尤其是二战结束以后,英国实现加速度的经济增长,该趋势仅仅在近些年才开始出现逆转。

图 2 英国经济的长期增长表现 图 3 美国经济的长期增长表现

数据来源: The Maddison Project 2013 Version, 作者对人均 GDP 数据进行 HP 滤波处理。

可以采用同样方法处理美国人均 GDP 数据。至 19 世纪初,工业革命开始向北美扩散。如图 3 所示,1800 年,美国人均 GDP 为 1296 国际元,约为英国的 60%。至 1901 年,美国人均 GDP 达到 4462 国际元,首次超过英国。所以,我们可以将 1800 年至 1900 年视为美国的追赶周期,1900 年之后将美国视为前沿国家。从图 3 可以看出,美国在追赶期间的人均 GDP 增长率没有呈现出“追赶周期”理论预测的倒 U 型增长路径,而是实现了稳定的持续增长。1800 - 1900 年,美国的人均 GDP 增长率稳中有升,年均增长率从前 50 年的 0.78%,提高至后 50 年的 1.52%。即使在成为前沿国家之后,如果剔除掉两次世界大战的外部冲击,美国依然维持了较高水平的增长,人均 GDP 增长率未出现明显下滑。

图 4 法国经济的长期增长表现 图 5 德国经济的长期增长表现

数据来源: The Maddison Project 2013 Version, 作者对人均 GDP 数据进行 HP 滤波处理。

德国和法国是另外两个重要国家,也未呈现追赶周期理论预测的倒 U 型增长路径。在“一战”前的 1913 年,德、法的人均 GDP 分别为 3648 国际元和 3485 国际元,分别达到英国的 74% 和 71%,已经很接近前沿国家(见图 4、图 5);但是

从此前的经济增长来看,两国增速都比较平稳,也并未呈现倒 U 型追赶路径。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两国经济大起大落;二战后,两国都经历了报复性高速增长。20 世纪 70 年代后,两国经济增长都渐趋平稳,恢复至两次世界大战前的增速。

日本在二战以后的增长路径被认为与追赶周期理论的预测相一致。但是,如果将时间序列拉长,日本的追赶周期实际上始于 19 世纪 60 年代的明治维新。如图 6 所示,1870 年,日本的人均 GDP 为 737 国际元,大致相当于英国的四分之一、美国的三分之一、德法的五分之二;至太平洋战争前夕的 1940 年,日本人均 GDP 增至 2870 国际元,大致为英美的五分之二、德法的四分之三,已经属于比较先进的工业化国家。在此期间,日本经济的增长率比较平稳,大约维持在 2% 左右,没有经历追赶周期理论预测的增长率加速的时期。从二战结束到 70 年代初期,日本确实经历了高速增长,但是如果联系其他主要国家同期的增长表现,这种增长就很容易理解为战后重建导致的报复性增长。

图 6 日本经济的长期增长表现

数据来源: The Maddison Project 2013 Version, 作者对人均 GDP 数据进行 HP 滤波处理。

从 70 年代至今,日本经济从减速到逐步走向衰退,日本政府的错误政策需要承担巨大责任,而绝非追赶周期作用的结果。70 年代,日本经济增速开始下滑,部分原因在于石油危机造成外部需求环境发生变化;但是危机过后,日本经济并未快速恢复,表明日本衰落另有原因。70 年代,田中角荣提出“发展均衡国家”,并实施一系列的“全国综合开发计划”,财政拨款必须均匀,导致日本的投资效率下降,城市的有效劳动力供给不足。80 年代以后,由于强大的既得利益阻碍,没有及时推动农业、服务业的贸易自由化改革,反而选择日元升值的方式来平衡贸易。同时,过快的金融自由化改革和错误的货币政策造成巨大的经济泡沫。泡沫破灭之后,政府难以及时处理不良债权问题,也无法对基于主办银行制度的低效金融体制进行结构改革;在未进行结构改革的情形下,政府急于推出宏观刺激政策,可能在短期内具有增长效应,但终究不可持续,反而造成巨大的公共债务负担。另外,微观企业实行的终身雇佣制度,强化了劳动力市场的僵硬程度。上述各种制度和政策都导致制造业生产成本急剧上升,企业丧失竞争力,大量企业无奈之下选择外迁,在全球寻找低成本的栖息地,造成日本产业空心化。由于经济陷入衰退,年轻人难以找到全职的就业岗位,致使日本社会出现现代际贫困,也更加加剧了日本生育率下降、少子化与经济衰退恶性循环的困境。

世界主要国家的经济增长史表明,追赶周期理论预测的后发国家倒 U 型增

长路径并不存在,这是因为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众多,至少包括资本积累、技术、创新、贸易、收入分配、制度和政治等多个方面<sup>[15]</sup>,并非只有技术追赶因素在起作用。欧美发达国家通过宗教文化变革、所有权革命以及政治改革等措施实现社会转型,建立起经济增长的长效机制,因而可以实现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增长。反观日本,在经历近 50 年的增长之后,终究无法突破制度约束,走向衰退在所难免。

## (二)中国尚未到“增长阶段转换”

1. 人口红利尚未消失。蔡昉的系列研究认为,中国正处在刘易斯拐点,人口红利趋于消失。<sup>[16]</sup>但是,他也承认,中国乡村 2004 年尚存在约 1.2 亿剩余劳动力。<sup>[17]</sup>这本身就是一个悖论。按照官方的说法,中国 2004 年需要种地的农民数量为 1.8 亿;考虑到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和农业生产效率的快速提高,当前农业需要的劳动力数量将进一步下降。例如,2004 年中国农业机械总动力为 6.4 亿千瓦;至 2014 年,已经提高到 10.8 亿千瓦,增幅接近 70%。假设近十年的技术进步每年可以节约 1% 的劳动力,那么 2014 年农业需要的劳动力数量大约为 1.62 亿。而 2014 年末转移的农村劳动力为 2.65 亿人(如表 1 所示),所以目前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存量大约还有 1.03 亿人。2014 年,全球人口超过 1 亿的国家只有 13 个。相比之下,1.03 亿的剩余劳动力其实是很大的数量。从动态来看,随着农业生产技术进一步提高,将会陆续释放更多的剩余劳动力。

表 1 未转移的农村劳动力数量

注:“乡村从业人员”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农民工数量来源于历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04 年数据来源于蔡昉<sup>[18]</sup>。“乡村从业人员”指标可被认为是乡村劳动力及乡村经济活动人口数量。国家统计局未公布 2013、2014 年的“乡村从业人员”数据,这两年的未转移劳动力数量根据 2012 年“乡村从业人员”数量计算。

关于人口红利的另一个争议是年龄结构,许多学者对中国人口步入老龄化比较担忧。例如,蔡昉指出,在农村剩余劳动力中,50% 是 40 岁以上的经济活动人口,40 岁以下的剩余劳动力为 5800 万。<sup>[19]</sup>首先,关注绝对数量。5800 万 40 岁以下劳动力是非常庞大的数字,这已经与英法的全国人口数量接近。其次,即便 40 岁以上的劳动力,只要经济政策得当,也具有很大的生产潜力和转移的可能空间。从横向比较来看,中国人口红利的存量并未消失;相反,当前仍处在人口红利高峰期。根据联合国人口统计的数据,中国工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在 2010 年达到 73.5% 的峰值,当时为世界各国最高(见下页图 7)。此后,该指标

逐渐下降;但与其他主要国家相比,目前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优势依然明显。

图7 主要国家或地区的工龄人口(15-64岁)占全部人口的比例(%)

数据来源:联合国人口统计数据库。

2. 出口潜力依然很大。“新常态”论认为,中国的出口增长潜力耗尽,主要因为随着中国经济规模进一步扩大,世界市场难以完全消化中国产品。以其他贸易大国作对比,日本和德国的商品出口占世界比重分别在1986、1987年达到峰值,占比分别为9.86%、11.70%,此后都开始下滑,尤其是日本。<sup>[20]</sup>2014年,中国占世界商品出口比重为世界之最佳的12.37%,与日、德的巅峰值很接近。按照德日的规律,中国占世界出口的比重也将下滑,因此很难再靠出口来拉动增长。

上述逻辑似是而非,忽略了中国作为人口最大国家的特殊国情。德国和日本在出口比重达到峰值时,二者的人口占全球的比重分别约为1.6%、2.5%;而目前中国人口占全球比重达到近20%,即使考虑到人口质量,中国出口仍然具有较大的增长空间。如果以人均商品出口数量进行比较,中国的出口潜力依然很大。2014年,世界人均商品出口额约为2615美元。德国至今依然为世界出口大国,2014年的人均商品出口额达到18292美元。中国2014年的人均出口额只有1713美元,大概只有世界人均水平的66%,德国的9.4%。中国具有巨大的产能,但是由于消费能力有限,必须将商品销往其他国家。

3. 技术差距依然较大。根据“新常态”论,只有当追赶国家的技术水平接近前沿国家时才会出现经济增长从高速向中低速的“增长阶段转换”。但是,中国与前沿国家相比仍然有很大的技术差距。根据中国科技部2009年发布的报告《对外技术依存度与我国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中国的技术对外依存度高达50%以上,而美、日对外技术依存度仅为5%。从知识创造的角度来看,中国的科研机构与世界一流水平仍然相去甚远。根据2014年“世界大学学术排名”的数据,中国无一所高校进入全球前100名,仅6所高校进入前200名;相较而言,美欧发达国家的高校在这份榜单中则占据绝对优势。即使以东亚成功追赶经济体作为对比,日、韩和中国台湾分别是在TFP达到美国的约70%、70%、100%时才开始步入低速增长阶段,而中国2009年的TFP水平只有美国的40%。<sup>[21]</sup>

4. 环境约束仍可突破。中国的经济增长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但二者之间并非完全不可调和。中国的污染格外严重,主要原因在于政府在污染治理和环境保护方面的不作为。中国地方政府之间存在横向竞争,地方官员为了实现

政治晋升,都有降低环境标准以推动经济增长的强烈动机,这就是所谓的“Pollution for Promotion”。<sup>[22]</sup>

中国政府应当在环境保护中更有作为,但绝不能为此而放弃经济增长。由于污染具有公共品的属性,因此治理污染的成本不应该由企业承担,否则将会造成大量失业。在当前体制下,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建立治理污染的公共设施,对污染物进行集中处理,确保政府公共支出可以进入企业的生产函数,从而可以获得规模经济效应、降低治污成本,因此中国经济增长的环境约束并非无法突破。

#### 四、中国经济减速的真实原因

中国经济持续下滑并非由于增长潜力下降。政府近年来实施的系列经济政策主要包括平衡贸易政策、产业升级政策、收入分配政策以及金融危机以来的救市政策等,其负面效应逐渐显现。在它们的综合作用下,实体经济的投资回报率下降,全社会进行生产性固定资产投资的意愿下降,引起整个宏观经济持续下滑。

##### (一)平衡贸易政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依靠出口推动的新古典增长实现了快速增长<sup>[23]</sup>,但也因此累积了大量的贸易顺差。从历史经验看,平衡贸易顺差的最佳方式是推动贸易自由化,开放农业、服务业等发达国家具有比较竞争优势的产业。但是,中国近年来贸易自由化改革难以取得进展,政府只好选择了人民币升值和刺激内需的方式。从2005年汇改至今,人民币对美元已经升值30%以上。为了刺激内需,政府开始频繁干预劳动力市场,努力提高工人工资,进一步提高企业生产成本。从2005年至今,全国各省平均月最低工资标准从369元提高至1137元,年均增速达到13.5%;制造业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年均增速为13.7%(见图8、图9)。此外,政府还逐渐取消外资企业在中国的超国民待遇。这些政策推高了企业的生产成本,降低了中国商品的出口竞争力。

图8 全国平均月最低工资标准(元) 图9 制造业人均工资(元)

数据来源:各省月最低工资标准来源于WIND数据库,除了北京、上海、天津,其他省份均按照最低档标准计算;制造业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平衡贸易政策的负面效应逐步显现。如下页图10所示,中国2001年加入WTO,外贸由此开始加速增长,2004年出口增速达到35%的峰值。2005年7月,中国开始汇改,人民币开始升值。至2008年金融危机,中国出口增速开始明显下滑,并引起进口增速也出现下滑。虽然危机已经过



去多年,世界贸易开始逐渐恢复,但中国的对外贸易增速下降的趋势未见好转。

尽管 2005 年以后人民币升值引起出口增速下降,但却无法平衡中国的对外贸易顺差,原因在于中国的贸易顺差源于结构问题,无法通过调整价格实现平衡:一是作为处在经济起飞阶段且以农民为主要人口的国家,中国的内需增长速度无法赶上产能的释放速度,必须要通过出口来平衡;二是因为制造业具有规模经济效应,以制造立国的国家更易于形成贸易顺差。

图 10 中国贸易的变动趋势(亿美元) 图 11 中国消费支出实际同比增速(%)

数据来源:WIND 数据库。

从逻辑上讲,刺激内需的政策也难以奏效,反而可能扰乱市场。持久收入理论认为,消费支出决定于居民的持久性收入而非当期收入,因此对内需的短暂刺激不会带来消费水平的持续提高。在以出口推动经济增长的中国,居民的收入水平决定于就业,而就业取决于生产性固定资产投资,进而决定于出口贸易。因此,居民消费是出口的结果。随着出口增速的下降,政府很难通过刺激内需来实现贸易平衡和经济增长。除了 2003 年“非典”时期,近些年中国消费的增速都是很稳定的,大约维持在 9% 左右(见图 11)。

## (二)产业升级政策

新古典增长会导致资本的边际报酬递减。对此,政府应当增加人力资本投资、提升要素禀赋结构,一是通过发展职业教育培训农民工,帮助他们从农民转变成成为训练有素的产业工人;二是发展高等教育,为企业进行技术研发提供人才支持。但是,政府在人力资本方面的投资不足,却希望强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通过各类产业规划,政府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例如新能源、新材料等。但由于现有要素禀赋结构并不匹配,市场不会积极响应,因而需要投入更多的补贴,或直接由国企进行投资。一是导致投资效率低下,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二是破坏了市场机制,民营经济进一步被挤出,实体经济的投资环境恶化;三是造成就业机会重新分配,加大了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实际上扩大了收入差距。

## (三)收入再分配政策

当市场配置资源时,会产生收入分配不均的问题。一是要素收入的分配不均。由于中国具有劳动力要素充裕的禀赋结构,资本收入的增长速度会高于劳动力收入。二是地区间收入不均,表现在城乡不均和东西部不均,这是由城市经济的集聚效应和国际贸易的经济地理效应决定的。面对上述问题,更为有效的选择是通过创造就业机会、改革户籍管理制度等措施,实现人口自由流动,将更

多的农民转变为产业工人,从而有机会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但是,政府的选择是收入再分配政策,例如三农政策、《新劳动合同法》以及西部大开发。

从2004年开始,政府开始实施三农政策,加大对农业、农村和农民的补贴。三农政策提高了农民工进城打工的机会成本,会推高制造业企业的用工成本,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大量剩余劳动力和有效劳动供给不足并存的现实悖论。2008年,《新劳动合同法》开始实行,进一步提高了企业生产成本,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制鞋行业为例,企业的直接用工成本将因为实施新法而提高10% - 20%。<sup>[24]</sup>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效果也十分有限。由于西部远离海洋,运输成本太高,因而无法承接附加值较低、运费相对昂贵的出口产业。而且西部人口居住分散,没有城市的集聚效应,因而也不适合发展内贸。因此,西部大开发实际上主要是开发西部地区的自然资源。首先,由于开矿产业属于资本密集型产业,无法创造就业,对当地居民提高收入水平的影响有限;其次,由于缺乏监督机制,以及西部的生态环境本来就十分脆弱,开采资源导致西部的生态环境被严重破坏;最后,由于矿山的开采权垄断在地方政府手中,因而容易引起地方官员腐败。

#### (四)金融危机以后的救市政策

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中国政府推出4万亿财政刺激政策。如果加上信贷配套和地方政府支出,真实数额可能接近40万亿,占到GDP比重约120%。这些资金主要投向基础设施领域。如今,大规模刺激的负面效应逐渐显现。首先,政府主导的投资大多是回报率很低的低效项目,难以推动经济实现可持续增长。其次,会提高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对私人投资产生挤出效应,并引导资金进入房地产和金融交易领域,造成房价泡沫和金融泡沫。再次,政府主导资源分配时会产生寻租空间,滋生腐败。最后,由于投资效率低下,所投资项目可能需要进一步的政府补贴或追加投资,从而产生巨大的财政负担,并通过税收转嫁到私人部门。

###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各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历程表明,一国经济在追赶过程当中并不必然遵循倒U型增长路径。“新常态”论关于中国处在“增长阶段转换”时期的观点也与当前现实不相符合,因此关于中国经济减速是“新常态”的论断有待进一步研究。

从历史经验来看,一国经济出现下滑大多是因为经济政策出现问题。本文的分析表明,中国经济减速的真实原因在于政府近年来实施的系列经济政策逐渐释放负面效应,包括平衡贸易政策、产业升级政策、收入再分配政策以及金融危机以来的救市政策等。随着以出口推动的新古典增长转变为以政府投资主导的泡沫增长,中国经济的减速在所难免。因此,中国经济减速不是“新常态”,而是经济政策的负面效应导致的“增长型衰退”,即伴随着越来越多的闲置产能和失业的经济增长。<sup>[25]</sup>

如果政府能够转变政策方向,中国经济依然可以恢复高速增长。一是要进行结构性改革,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占据主导地位。首先,坚持对外开放,推动服

务业和农业的贸易自由化;其次,改革金融体制,打破国有银行的垄断局面,实现充分竞争;再次,逐渐放松严格的产业规划政策,降低准入门槛;最后,改革户籍管理制度,促进人口向大中城市流动,充分利用城市经济的集聚效应。二是要实施宽松的宏观政策,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在结构改革的基础上,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实施积极的减税政策,降低生产企业的税收成本;建立有效的弹性劳动力市场,降低企业的用工成本。

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建设制度性市场经济和建设对外开放新体制的重大突破。只要坚持贯彻执行十八届三中全会重大决议,推动经济政策转向和经济体制改革,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潜力方可转变为现实。

### 注释:

[1]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

[2]数据来源于IMF 2015年10月份《世界经济展望》报告。

[3]张军:《中国经济的“非常态”》,《中国证券期货》2015年第3期。

[4]华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并未终结》,《人民论坛》2014年第2期。

[5]张军扩:《中国追赶型增长的阶段转换与增长前景》,《经济体制改革》2015年第1期。

[6]基于2015年7月24日的检索结果。

[7][9][10]张军扩、余斌、吴振宇:《增长阶段转换的成因、挑战和对策》,《管理世界》2014年第12期。

[8]余斌、吴振宇:《中国经济新常态与宏观调控政策取向》,《改革》2014年第11期。

[11][21]刘培林、贾琨、张勋:《后发经济体的“追赶周期”》,《管理世界》2015年第5期。

[12]刘伟、苏剑:《“新常态”下的中国宏观调控》,《经济科学》2014年第4期;沈坤荣、滕永乐:《结构性减速下的中国经济增长》,《经济学家》2013年第8期;赵振华:《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认识误区及解读》,《经济纵横》2015年第3期;张占斌、周跃辉:《关于中国经济新常态若干问题的解析与思考》,《经济体制改革》2015年第1期。

[13]该部分使用的各国人均GDP数据都来源于The Maddison - Project, [http://www. ggdc. net/maddison/maddison - project/home. htm](http://www.ggdc.net/maddison/maddison-project/home.htm), 2013 version.

[14]Backus, D. K. and P. J. Kehoe, International Evidence on the Historical Properties of Business Cycl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2, 82(4), pp. 864 - 888.

[15][以色列]E·赫尔普曼:《经济增长的秘密》,王世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

[16]蔡昉:《中国劳动力市场发育与就业变化》,《经济研究》2007年第7期;Cai, F. and M. Wang, A Counterfactual Analysis on Unlimited Surplus Labor in Rural China, *China & World Economy*, 2008(16), pp. 51 - 65;蔡昉:《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刘易斯拐点》,《经济研究》2010年第4期。

[17][18][19]蔡昉:《破解农村剩余劳动力之谜》,《中国人口科学》2007年第2期。

[20]该部分使用的各国贸易数据来源于WIND数据库,人口数据来源于联合国人口统计数据库。

[22]Jia, R., Pollution for Promotion, Working Paper of UCSD, 2014.

[23]华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逻辑与面临的选择》,《学术月刊》2009年第7期。

[24]周富春、王钟英、刘红:《新〈劳动合同法〉实施、用工成本直线上升——中国鞋厂廉价劳动力时代正式终结?》,《中国皮革》2008年第6期。

[25][美]保罗·克鲁格曼:《萧条经济学的回归》,刘波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

[责任编辑:文 谊]